

公安三袁文学成功的外因

周家洪

(长江大学 人文与新媒体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公安三袁在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功,除了内因之外,还有外因的作用。一是时代的因素。万历皇帝亲政后又怠政,朝廷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减弱,三袁可以多次与复古派进行激烈的争辩,并最终取得胜利;阳明心学为三袁文学理论主张提供了思想基础,李贽思想对三袁产生深刻的影响,使三袁尤其是袁宏道摆脱当时文坛复古思潮的束缚;明代尤其是晚明文人多喜欢结社,三袁因此形成公安派。二是三袁祖父袁大化要求子弟读书考取功名的家训,三袁父亲袁士瑜、外祖父龚大器、舅舅龚仲敏、龚仲庆家教的作用。三是楚文化对三袁的影响。四是三袁广泛的交友和游历。

关键词:三袁;公安派;文学;成功;外因

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0)05-0070-06

在现有的三袁和公安派的研究中,学术界对三袁的家世、成长过程,尤其是其与焦竑、李贽、汤显祖等人的交往和游历,三袁的文学成就、作品及作品集,公安派的纲领、成员、活动方式等关注较多,而对公安三袁在文学上取得成功的外因较少涉及。三袁文学上取得成功的原因有外因和内因。毫无疑问,内因是三袁的文学天赋、才能和勤奋等,那么公安三袁成功的外因有哪些呢?笔者认为,主要有时代的积极作用,三袁的家训、家教,楚文化的影响和三袁的交友、游历等。

一、时代对三袁的积极作用

三袁除了袁中道去世前6年生活在明代天启年间外,主要生活在明代万历年间。因此,万历时代对三袁影响很大。就三袁文学取得成功的外因而言,万历时代主要有万历皇帝怠政、王阳明心学和李贽思想、明代文人结社等的积极影响。

(一)万历皇帝怠政

公安三袁活跃在万历皇帝亲政后又怠政的时期。对封建统治而言,皇权减弱会带来很多坏处,但对三袁和公安派而言,皇权减弱产生了积极作用。万历前期张居正执政,以政治上的专制和思想上的

禁锢来保证其政令畅通,才取得了改革的成功。因此,张居正执政期间毁天下书院,禁止聚徒讲学,对异端思想进行镇压,何心隐就是在张居正执政期间的万历七年被杀的。张居正执政时期,三袁还小。张居正去世那年,袁宗道22岁,还未考中进士;袁宏道14岁,袁中道12岁。三袁主要活跃于张居正去世后的万历时期。如果三袁活跃在张居正执政时期,那也许就不会产生作为公安派领袖的三袁了。张居正去世后,神宗和朝臣清算张居正,内阁权威从此大为下降,但皇帝权威也并未真正树立起来。从万历十四年(1586)起,万历皇帝更是以身体不适为由,连续罢朝,不见大臣,不议国事,不及时处理奏疏,怠政长达三十多年。在皇权大为减弱有时甚至空缺的情况下,朝廷中各种力量自由博弈,意识形态领域控制松弛,朝野皆进入了一个言论相对自由、思想空前活跃的时期。三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自由发表他们包括文学观在内的思想观点,多次和复古派激烈争辩,最终取得了胜利。因此,皇权减弱是三袁取得反复古斗争胜利的前提。如果万历皇帝和古代历史上绝大多数皇帝一样,加强皇权,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三袁估计没有这么活跃,可能不会成功。

收稿日期:2020-04-18

基金项目:荆州智库课题“楚文化对三袁的影响”(Jzsk-yk2024)

作者简介:周家洪(1965-),男,湖北荆州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楚国历史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二)王阳明心学和李贽思想的影响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以心本体代替理本体,突出了人的主观意志,它对圣贤权威的责难、怀疑以及对自我良知的肯定使人们开始意识到并重视自身的主观思想,将人们从程朱理学圣贤之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晚明士人独立思考的精神,王学很快成为当时思想界的时尚。特别是万历十二年,王阳明从祀文庙,标志着其学说得到官方认可,王学思潮渐成主流。在考上科举前,三袁在家乡已经了解阳明心学,受心学的影响而激发、唤醒了独立的人格精神和文学自觉意识,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理论主张提供了思想基础。

王阳明逝世后,其弟子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的后继者、明代后期卓越思想家和文学家李贽追求精神解放,公开以“异端”自居,尖锐批判假道学,大胆肯定人的现实物质及精神欲望和追求,其激进思想对三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李贽作为晚明革新思潮的倡导者,他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成为晚明革新派作家的导师,也对三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袁都是李贽的崇拜者,曾多次拜访李贽,宾主相谈甚欢。尤其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袁专程去湖北麻城龙湖拜见李贽,求教释疑。之后,袁宗道作散文《龙湖》、袁宏道作《怀龙湖》《题壁》两首诗赞颂李贽。李贽对三袁也很欣赏,给予很高的评价,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此后,三袁与李贽诗书往来,共同反对复古思潮。三袁尤其是袁宏道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观最得李贽真传,受李贽影响很深,在思想和创作上迅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从万历十八年到万历二十七年,以三袁为首的公安派声势浩大,而李贽的“童心说”恰似源头活水,为公安派注入了无尽的动力。甚至可以说,袁宏道提出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等公安派理论的核心主张与接受李贽思想的影响有关。正是在李贽的影响下,袁宏道摆脱了当时统治文坛复古思潮的束缚,把文学导向表情达意的正确方向。

(三)明代文人结社的积极影响

明代尤其是中晚明文人多喜欢结社,以此作为交流平台,同派之间互相切磋,不同派别之间开展激辩,进而形成一定的文学主张,因此,明代尤其是中晚明时期文学发展流派较多。万历时期,各种文学流派始终围绕复古与革新展开激烈争辩。在公安派之前,倡导复古的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和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复古派主导文坛。归有光、焦

竑、李贽、汤显祖、徐渭等都对复古派的理论和创作有过激烈的批驳。公安派在前人反对复古派基础上批驳最为彻底,特别是袁宏道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理论主张,振聋发聩,震响当时文坛,“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淪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袁稽勋宏道》)完成对复古派的最后一击,复古派因此彻底退出文坛,以三袁为首的公安派取代后七子,引领晚明文坛潮流。

二、家训、家教对三袁的影响

除时代因素外,三袁能取得巨大的文学成就,与其祖父强调子弟读书考取功名的家训,父亲、外祖父和龚仲敏、龚仲庆两位舅舅的家教有关。

(一)家训对三袁的影响

三袁高祖元有伦迁到公安县长安里长安村定居后,逐渐发家致富,到三袁祖父元大化这一辈,元氏已经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富户了。三袁外公龚大器早年为诸生,家境贫寒。三袁祖父元大化把龚大器接到长安里供读,龚大器最终考中进士,进入仕途。此前因为闭塞,公安县的读书人害怕背井离乡,很少出去参加科举考试或交游,因而终老乡里。元大化和当地其他家族长辈一样,也没要求子弟出去参加科举考试。但从龚大器考取进士做官开始,元大化受到影响,改变看法,开始在子弟中强调读书,并要求子弟积极参加科举考试。三袁之父元士谕和三袁都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这与元大化的家训有直接关系。如果元大化没有要求子弟读书考取功名,三袁可能和众多当地人一样读书种田,一辈子不会走出长安里,功名就无从谈起。

(二)家教对三袁的影响

有了元大化的家训,还得有人付诸实践。三袁之父元士谕在元大化众多子弟中率先响应,开始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他刚开始考秀才时很顺利,但考进士时却屡试不中,在数十年的科举之路中屡败,终生没有及第,到老还是一位秀才。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儿辈身上,并从三袁小时候就开始启蒙教育,使得三袁具备良好的学识功底。在三袁成长过程中,元士谕时刻不忘督促三袁学业。三袁性格或散淡,或狂放,于功名仕宦并不十分热心,元士谕就不断督促,有时甚至很严厉。正是在元士谕的严格督促下,三袁才多次走出公安参加科举考试,扩大交游范围和视野,先后考中进士做官,取得功名。没有三袁之父元士谕的家教,三袁也可能无法取得成功。

元士谕既是一位严父,又是一位慈父。他对三袁的要求很严,但很讲究教育的方式方法,生动风趣。“近思先君子之教于三人,不宽不严,如染香行露,教之最有风趣者也。”^{[1](P489)}元士谕还经常参与三袁的文学活动,尤其是袁宗道考取进士及第后,元士谕的心态变得很平和,说话做事更能考虑三袁的意见,并未像中国古代社会中父亲对待儿子那样,为了保持所谓的父亲尊严而时时严厉和高高在上。另外,元士谕著有《四书解义》,给三袁著书立说树立了榜样。

三袁的外祖父龚大器及两位舅舅龚仲敏和龚仲庆对三袁文学上的启发和示范作用更加具体。三袁外祖父龚大器是三袁亲属中第一个读书为儒的人。他经过苦读终于考中进士,进入仕途,这对三袁有很大的激励作用。龚大器七十余岁致仕归里后,亲自组织南平文学社,被推为社长,常“与诸子诸孙唱和”。对于年少的三袁来说,外公龚大器就是他们读书做人、科举为官、作诗唱和的楷模。龚大器创办南平文学社,对袁宏道小时候创办城南社,袁宗道、袁宏道在北京创办蒲桃社(葡萄社)也有示范作用。

龚仲敏、龚仲庆对三袁的影响远远超过龚大器。三袁自小与诸舅交往频繁,相互间还能无拘无束地切磋学问。三袁称为“惟学舅”的龚仲敏(字惟学),万历年举人,少有俊才,博览群书,写得一手好文章,所著《嘉祥县志》为焦竑、李贽所赞赏。他创办阳春社,三袁参与其中,就此打开了三袁文学之门。“自有此社,人始知程墨之外,大有书帙;科名之外,大有学问。”(袁宗道:《白苏斋类集·送夹山母舅之任太原序》)可以说,龚仲敏对三袁的文学天赋起到了“点化熔铸”的作用。“宗道兄弟三人,游于都门,得与海内士大夫往还,二三名流俱不以碌碌庸陋见弃,推而附之大雅之林。其友之相习者戏谓:‘南平一片黄茆白苇,何得出尔三人!’盖谬疑开辟蓁芜自我兄弟,而不知点化熔铸,皆舅氏惟学先生力也。”^{[2](P128)}另外,龚仲敏创办阳春社,对袁宏道小时候创办城南社、袁宗道和袁宏道在北京创办蒲桃社(葡萄社)也有示范作用。被三袁称呼“惟长舅”的龚仲庆(字惟长),万历八年进士,曾任福建道御史等

职。他平生博览群书,家中藏书数万卷,著有《遁庵集》。龚大器、龚仲敏、龚仲庆父子三人使三袁很早就接触到儒、道、佛等思想,接触到文学,为其人格的定型、学养的丰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袁在成长过程中受家训家教的熏陶,在人品和学识上都大有长进。生长在有文化且长辈开明的家庭,使三袁能获得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心智独立,在逆流中辨清方向,始终保持自己的见解不动摇,这是他们倡导的文学革新运动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外因。

三、楚文化对三袁的影响

三袁远祖元本初由江西省丰城县元坊村迁到黄州蕲水县,洪武末年,元本初之孙元有伦迁到公安县长安里长安村,传到三袁已经是第五代。从三袁开始,由“元”姓改为“袁”姓。因此,三袁是地道的公安人,他们深受楚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①,也体现在他们像楚人一样敢为人先、不愿受拘束、学习先进和超越先进等方面。

(一) 充满自信,敢为人先

楚人从北方流迁到南方荆山汉水一带,经过近150年的艰苦奋斗后,到熊渠时开始强大,楚人开始充满自信,说话做事敢为天下先。熊渠封三子为王;楚武王熊通“我蛮夷也,不以中国之号谥”而自立为王,首创县制,创立国家体制,重用人才;楚王文创立法治社会;楚成王敢于与当时天下霸主齐桓公争霸;楚庄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观兵周郊、问鼎周室、邲之战战胜霸主晋国,确立楚国霸主地位等,这些都是楚人充满自信、敢为人先的体现。三袁在成长过程中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创立公安派以及与复古派的斗争等,都体现出自信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对他们的成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 喜欢自由自在,不愿受拘束

楚人喜欢自由自在,不愿受拘束。老庄思想尤其是庄子的逍遥游就是这种自由自在思想的集中体现。楚国多隐士^②,就是楚人喜欢个体自由自在、不愿受拘束的明证。虽然三袁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并先后考取科举,进入仕途,但纵观三袁一生可以看

① 参见袁麟《楚文化视域下的袁宏道诗歌创作析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洪彦龙《公安三袁交游与文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② 参见赵川、徐文武《论楚国农业发展与隐士阶层的兴起》,《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蒋波《论楚国的隐士群体及隐士政策》,《江汉论坛》,2014年第6期。

出,三袁并不愿受官场拘束,主要兴趣和精力都放在文学上,喜欢与朋友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历和论诗作文。因为袁宗道比两个弟弟年长,考虑问题比较周全,因此做官时间较长。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身份,开展文学活动,没离开官场。而袁宏道则不同,他取得的文学成就最大,但仅当了3年县令,在此期间被称为“清官”,因心不在官场,多次辞官,但未能如愿,索性挂印离职,和友人一起游山玩水。幸好有哥哥袁宗道在北京斡旋,他的官职才得以保留,但此后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文学上。袁宗道去世后,袁宏道回到家乡,修建了柳浪馆,和亲朋好友切磋文学,过了六年亦官亦隐的生活。袁中道一生更喜欢自由自在。之前因为有两个哥哥为官,所以他在几次科举未中后,索性放弃了科考。两个哥哥去世后,在老父亲的督促下,他再次参加科举考试,但考上后做官也是闲职,主要精力也放在文学上。因此,三袁尤其是袁宏道、袁中道对仕途不感兴趣,一生多半时间隐逸或游历,少半时间做官,主要精力放在感兴趣的文学上,是追求自由自在、不愿受拘束的体现,这对三袁文学上的成功具有重要作用。

(三)学习先进,超越先进

楚文化对三袁最大的影响,在于楚人海纳百川地学习先进之后的创新与超越。楚国能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与楚人在发展过程中以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广采博纳、善于学习他国先进事物是分不开的。例如楚国参考周朝的制度,在冶炼技术方面向越人学习,在铸造技术方面向随人学习等,然后融会贯通,不断创新,从而使“蕞尔小邦”的楚国超越北方诸强,成为春秋霸主国和战国七雄之一。

三袁在成长过程中,真诚地向前辈名家或大家学习,向反对复古的焦竑、李贽、汤显祖、徐渭等人学习,吸取其精华,融合创新,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公安派的心理理论主张,创作了体现其主张的大量文学作品,最终超越焦竑、李贽、汤显祖、徐渭等人,彻底击败复古派,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楚国善于学习他国先进事物、融合创新、超越先进的体现,是典型的楚文化精神内核的体现。

首先,三袁向焦竑学习。焦竑是明代著名学者、思想家和文学家,属于阳明后学泰州学派。他反对程朱理学,反对思想僵化,反对盲目相信古人,主张学贵自得,不依傍古人。在文学方面,他要求诗文“道胸中所欲言”,抒写“性灵”,重视作家的主观能动性;注重文章的内容,反对形式主义,对“前后七子”之流的盲目复古、僵化模拟多次抨击,在文坛复古风

靡之时独抗流俗。三袁中袁宗道于1587年最早问学于焦竑。在袁宗道的引见下,袁宏道和袁中道先后拜焦竑为师。焦竑反对复古的心学思想对三袁影响很大。在问学焦竑之前,三袁的文学思想和创作走的都是复古路线。袁宗道早年曾是王、李二人作品的爱好者与模仿者,“是其时,济南(李攀龙)、琅琊(王世贞)之集盛行,先生(指袁宗道)一阅,悉能熟诵,甫一操觚,即肖其语,弱冠,已有集,直谓此生当以文章名世矣”^{[1](P707)}。袁宏道“年方十五六岁……上自汉魏,下及三唐,随体模仿,无不立肖”^{[3](P1652)}。在问学于焦竑前,三袁的文学观和创作被前后七子所左右。他们与焦竑的遇合,是其文学思想与创作的转折点。袁宗道向焦竑问学后不久,便开始认真思考文学问题,转向反对复古。当时袁宗道在翰林院任职,馆里流行王世贞、李攀龙的诗文,“宗道和黄辉力排其说”。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也就是他向焦竑问学后第六年,提出“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的观点,与焦竑的“何至甘死古人脚下”如出一辙。更重要的是,他借用焦竑的“性灵”一词,赋予新的内涵,使之成为公安派的核心概念。

其次,三袁向李贽学习。继焦竑之后三袁向其学习的人是李贽,此前面已经论述,故不再赘述。

再次,三袁向汤显祖学习。汤显祖早于三袁在文坛出名。万历二十三年(1595),汤显祖去北京述职,与袁宏道初次结识,发现双方在人格追求、思想观念等相契颇深,相见恨晚。此后汤显祖与公安派成员尤其是三袁多有往来。汤显祖先于三袁向后七子复古派首领王世贞发难,倡导“性灵”或“灵性”,其“灵”则以“情”为基础,认为无“情”便无诗文,“灵”以“奇”为特色。三袁文学理论的核心是主“性灵”、倡“趣”味,由此可见,汤显祖的文学理论对三袁尤其是袁宏道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结识汤显祖后不久,袁宏道在吴地这个复古重镇向复古派发动进攻,矛头不仅指向复古首领王世贞、李攀龙,而且横扫他们的追随者,最终将复古势力彻底逐出了晚明文坛,取得最后胜利。由此可见,公安派在反对复古派斗争中,善于向汤显祖学习并融会贯通,最后超越了汤显祖。

最后,三袁向徐渭学习。万历二十五年(1597),袁宏道与陶望龄同游吴越期间,在陶望龄家里发现并阅读了徐渭的诗集,欣喜若狂,推称徐渭为明代第一诗人。三袁尤其是袁宏道,十分看重徐渭与复古派势不两立的人格精神,吸取了徐渭反对复古的主张。徐渭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也对袁宏道后期产生了

影响,并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之后袁宏道提出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中体现出来,部分纠正了自己在前期创作中只重个人情趣、与客观社会绝缘的倾向。此外,徐渭强调“本色”“自然”,解决了雅俗之间的矛盾,对袁宏道也有启发。我国古代视经史诗文为正统,词曲、小说、戏剧为小道,直到明朝前中期这个观点仍未完全改变。三袁尤其袁宏道受到徐渭强调“本色”“自然”的影响,对小说、戏曲、民歌非常重视。袁宏道和公安派其他作家一起创作了大量民歌和民间故事,袁宗道善于创作当时不登大雅之堂的词曲,袁宏道在任吴县县令期间,经常和江盈科等去听民歌,践行其重视通俗文学的主张。

四、三袁的交友与游历

明代中晚期尤其是晚明,文人结社成为一种潮流,三袁从小到大不断结识各种各样的人,选择志同道合的人结为朋友,一生交友十分广泛,这对他们文学上的成功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他们经常去全国各地游历,这也成为他们文学上成功的一个重要外因。

(一)三袁的交友

三袁交往的人分为亲属、老师、同学、同事和僧侣等。亲属除了父亲、外公、龚仲敏和龚仲庆两位舅舅外,还有叔父袁士玉,族叔兰泽、云泽,异母弟安道、宁道,族弟履道、致道、宗成、寓庸、无学,舅父仲安、惟用,表兄弟王回、王承光、王承煌、王大壑,姊夫毛太初,袁宏道妻弟李学元,袁中道姻亲鲁印山等。这些亲属是三袁走出公安县、参加科举考试前的主要交往对象,对他们幼时的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走出公安县之前,三袁的主要交往对象除了亲属,还有同学和老师。在考上科举前的学习过程中,三袁选择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交往,如崔晦之、邹伯学、李流芳、贺中冷等。袁宏道早年的很多诗歌都是与同学好友的交游之作。除同学外还有老师,如启蒙师万莹、吕邦永,举业师王辄、邹迪光等。

在考中进士前,三袁交往的外乡人主要是焦竑和李贽。考中进士、出仕为官后,三袁除继续与焦竑、李贽交往之外,也开始选择志趣相投的同事,与之交流,探讨诗文和一些社会问题。如袁宗道进入翰林院后,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文人圈,包括陶望龄、黄辉、董其昌、苏惟霖、吴用先、顾天埃、李腾芳、

王图、黄大节等人。袁宏道与江盈科之间的友情正是二人同在吴地的吴县和苏州县当县令时形成的。在此期间,二人正式提出“性灵”概念,对于吴地税赋沉重和民生疾苦也有共识。

诗文书画之友往往也是三袁交往的对象,如董其昌、米万钟、王稚登、黄辉、文震孟等人,当然也包括前述部分同事。这些人不仅具有文学才能,而且擅长于书法绘画。董其昌为明代著名书画家;文震孟为文征明曾孙,家学渊源深厚;黄辉书法在当时就与董其昌齐名。三袁爱好书画,袁宏道还曾向黄辉请教写字的方法。这些人对三袁既有书画方面的影响,又有思想方面的沟通。

三袁还与很多其他文人交往,如王百谷等先辈、李维械、潘之恒、曹子念等后七子成员,方文撰、雷思霈、汤宾尹等公安派成员,钟惺等竟陵派领军人物等。

三袁还与僧侣交往。在年轻时,三袁便对佛禅之学感兴趣,这与其父袁士瑜对佛禅之学感兴趣有关。袁宗道进士及第后,在京师会友学佛,参与悦禅之会。这对袁宏道、袁中道及其他公安派文人产生了直接影响。因此,三袁交往对象中有许多僧人,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友情,如宝方、寒灰、无迹、冷云、雪照等。这些僧人为三袁寻求栖隐生活、清净避世提供了某种精神力量。三袁与僧人频繁交往多为弃官隐居、纵情山水之时。如袁宏道在袁宗道去世后,归乡栖居柳浪馆,倾心佛学,曾多次远游,包括庐山之游、桃源之游等,所以僧人是必不可少的交游伙伴。袁中道也常探访山间寺庙。公安派也有佛教意味浓厚的交游聚会。^①

三袁与以上人士交往,对他们不同时期不同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先后对三袁文学理论和创作产生重要甚至决定性影响的人,是前述与之交游的焦竑、李贽和汤显祖等。他们共同帮助三袁开阔视野,冲破罗网,成为三袁文学上成功的最主要外因。

(二)三袁的游历

三袁广泛地游历各地风景名胜,也是成功的外因之一。古代尤其是唐朝及其以后,许多文学大家都曾主动或被迫游历全国各地尤其是名山大川,如李白、杜甫、唐宋散文八大家等。三袁也不例外,他们一生广游各地名山大川。袁宗道主要游历家乡和

^① 参见洪彦龙《公安三袁交游与文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北京各地,范围相对狭窄。袁宏道游历范围比袁宗道广得多,除了家乡和北京各地外,还曾到过无锡、杭州、绍兴、桐庐、歙县等地游山玩水。三兄弟中,袁中道游历最广。万历二十三年(1595),袁中道应大同巡抚梅国桢的邀请,漫游塞上。离开塞上后,他又漫游齐鲁名胜,登泰山,观日出。九月继续漫游吴越皖风景名胜。万历三十六年(1608)回到公安,遍览湖南澧州、德山、桃源等地的风景名胜。次年在沙市购买一只木船,顺江而下,先后游览石首绣林、华容古道、洞庭君山、赤壁古战场、黄鹤楼、晴川阁、六朝古都金陵、镇江甘露寺,然后北转运河,饱览运河风

光,最后回到北京。广泛的游历,为三袁的文学创作提供灵感、题材和内容,扩大了三袁的交游范围,开阔了三袁的视野,使他们在思想情感和人生阅历上都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如果没有这种游历,他们的文学创作成就,尤其是山水游记类的文学成就应该会大打折扣。

参考文献:

- [1]袁中道.珂雪斋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袁宗道.白苏斋类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袁宏道.袁宏道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 刘春丽 E-mail:157476703@qq.com

External Causes for the Success of Three Yuan Brothers' Literature in Gong'an County

Zhou Jia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New Media,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23, Hubei)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internal causes, there are also external causes for the great success of three Yuan brothers from Gong'an county in literature. The first external cause is the factor of time. After the emperor Wanli was in power, he was idle, and the control of the imperial court over the ideological field was weakened, thus the three Yuan brothers could engage in fierce debates with the classicist school for many times and finally won the victory; Wang Yangming's ideology on mind provide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three Yuan brothers' literary theory, while Li Zhi's thought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three Yuan brothers, and made the three Yuan brothers, especially Yuan Hongdao, get rid of the shackles of the thoughts of restoring ancient ways in the literary world at that time; In the Ming Dynasty, especially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literati liked to form associations, so the three Yuan brothers formed the Gong'an school. The second external cause is the family instruction of the three Yuan brothers' grandfather, Yuan Dahua, who asked his children to gain fame by reading, and the role of home tutoring by the three Yuan brothers' father Yuan Shiyu, their grandfather Gong Daqi, and their uncles Gong Zhongmin and Gong Zhongqing. The third external cause is the influence of Chu culture on the three Yuan brothers. The fourth external cause is three Yuan brothers' extensive friend-making and travelling.

Key words: three Yuan brothers; Gong'an county; literature; success; external causes